

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

陶松云 郑家红

[内容提要]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其时间远比西方哥伦布航海为早,其航海条件及规模也远比后者优越,然而,却是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十五世纪的中国与西方的不同社会背景,决定了各自不同的航海动机和目标,从而也得到了不同的效果和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500年前,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克里斯多芬·哥伦布于1492年率领三条小船(旗舰圣玛丽号载重约100吨,平塔号约60吨,尼尼亚号约50吨,探险远航队伍共计88人),跨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到达美洲的瓦特林岛,实现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人民之间的首次会合。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哥伦布航海前80多年,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05—1433),我国郑和(史称三保太监)已七次下西洋。郑和首次出海率领的船队,远比哥伦布所率船队要大。1405年,郑和率领208艘海船出航,根据船的大小性能分为宝船(最大载重1500吨,每船可容四五百人)、马船、粮船、座船和战船五类,首次出航人数为27870人。包括使节、随员、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人员、翻译、医生等,可谓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航行远至非洲东岸及马达加斯加岛。郑和航海足以证明,中国远比西方为早地具备了环球远航必须的优越条件、物资装备和专业人员。然而,却是西方的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是偶然中经常也会包含着必然。要深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十五世纪中国和西班牙两国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航海目标,以及随之产生的后果诸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唐朝中叶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对外交流之路渐由陆路转向海路。南宋由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①海外经济交流日趋重要。这种情况历元代而不衰。当时中国海舶曾远抵波斯湾、亚丁湾并控制了中印之间的海上贸易。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潮流的。但郑和远航是否也属于这种以经济发展之需要作为主要动因呢?

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十五世纪的明王朝,从根本上讲,仍处于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迟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高。从明初几十年的经济史料中还看不到商品经济象在明中叶以后那种巨大的活跃的高涨。一般说来,当时尚无大规模进行海外贸易的迫切需要。其次,明初统治者固守“重本抑末”的传统,极力限制民间对外贸易。明廷严禁“私出海”和“私自下番”^②,压制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社会需求。因此,不能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仅仅归结为进行海外贸易。

关于郑和航海的动因,固有多种说法,但从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即象西方探险者那样,是为寻找一块新的地域或一条通往某地之航线。

值得提出的是明朝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但是明初的国际地位却不高,在海外不断发生轻视、戏谑直至屠杀中国使臣的

事件。如爪哇,洪武十三年(1380)明朝政府“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绶,三佛齐诱而杀之。”^⑧这种状况延至郑和首次下西洋时还未改变,以致永乐四年(1406)爪哇在内讧中杀死郑和部卒170余人。此外,东南沿海以至南海诸岛还有各种反明势力在活跃着,构成了对明王朝的直接威胁。为树立明帝国在沿海地区、东南亚及海外国家中的威信,明王朝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明成祖任命宦官郑和组织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耀兵于周囷海域,广交近邻远邦。郑和前三次航海,行踪未出东南亚和南亚沿海诸国,后四次则以此为基础,向南亚以西由近而远开拓更大范围的外交活动,使海外远国也重泽而来,宾服中国。由此可见,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在明帝国周围(当时已知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推行明室交给的政治、外交使命。^④

哥伦布时代的西班牙却大大不同于中国。十五世纪下半叶,通过联姻统一的西班牙商品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且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货币取代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象征。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发展。同时,王权不断强化,官僚机构日趋庞大,封建国家和王公贵族的公私开支与日俱增。于是,西班牙对贵金属的需求急剧增长。与此相反,从十四世纪起,欧洲旧金银矿产量日减,1450年以后欧洲的白银大国德国,其产量已远远不敷全欧之需。因此,从外部获取黄金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同时,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东方遍地黄金的情景,刺激着西班牙人的欲望,推动他们力争解除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长期垄断,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正如恩格斯所说:“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⑨

哥伦布本是意大利热那亚的一名水手,较早就有献身海洋探险事业的抱负和西航的计划。但是他个人的航海计划,只有加上探寻大量金银和运销东方香料等因素,符合西班牙的社会需要时,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同和资助,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正是为了寻找黄金争夺东方——中国和印度,西班牙政府才毅然支持哥伦布另辟蹊径,勇往直西,跨越大西洋。终于完成了美洲在地理学领域中的被发现。

2

十五世纪中国和西班牙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两国各自远航目标的选择和出航的动机。目的不同,主要后果也迥异。

哥伦布的远航,给美洲各族人民带来了一个持续三百年的殖民主义暴力统治时代。而其远航本身,就是这种暴力掠夺的一部分。1492年哥伦布首次抵达美洲,第一次踏上西印度群岛,就用暴力捕捉了几个印第安人,以获取岛上情报。^⑩1496年,当他第二次航行美洲期间,海地印第安人揭竿而起时,哥伦布立即进行镇压。并把战争中俘获的印地安人变为奴隶,并将其中500名运往欧洲。^⑪哥伦布榜样在前,其他殖民者效法于后,暴力劫掠愈演愈烈。致使西印度半岛至少有100万印第安人在这样的大破坏中被毁灭。^⑫

哥伦布的航海为西班牙开辟了广阔的财源。美洲航行一开通,新大陆的贵金属立即如潮水般地涌入西班牙。例如,1593年运回西班牙的美洲船货中,金银竟占95.62%。^⑬1511至1515年,金银流入量比1505年几乎翻了一番。^⑭统计材料还表明,1503年至1560年流入母国的贵金属达447,820,932.3比索。^⑮大量贵金属的获得,刺激了工商业一度飞跃发展。塞维尔迅速变为全欧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其人口从1517年的25,000人增长到1594年的90,000人。^⑯大量金银流入同时引起急剧的价格革命,使西班牙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据统计,十六世纪最初25年,西班牙物价上涨了51.5%,到上半世纪上涨107.61%。^⑰1601年的物价,竟上涨到1501年的4.32倍,甚至5倍。^⑱“物价上涨是如此猛烈,以致大贵族们、绅士们、

平民百姓以及教士们都无法靠其收入过活。”⁴⁸西班牙的资本原始积累急剧地演进着。

同西班牙的哥伦布相反,中国郑和的远航活动,基本上是与亚非诸国进行和平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些和平交往包括(一)代表明帝“敕封”和“赏赐”所主地区的国王、酋长等外交活动;(二)迎送各国使节;(三)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促进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四)经济贸易。

这里有几点值得指出:(1)在当时的条件下,“封敕”、“赏赐”等活动,毕竟还表现出“天朝”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2)经济贸易也贯彻“厚往薄来”的原则,以显示中华帝国之大度和自尊;(3)必要时以武装和暴力作为与各国交往的后盾。所到之处,“宣天子诏,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力慑之。”⁴⁹但纵观郑和航海活动的全过程,他给亚非各国人民带来的是友好情谊、文明和社会进步。

史料证明,在郑和下西洋的随后岁月中,一些郑和访问过的国家,如渤泥国“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⁴⁸在真腊国,“其见唐人,亦颇加敬畏,呼之曰‘佛’云。”“观通典、通考、各代异域志,诸书所载,未有如此之异者。”⁴⁹时至今日,在郑和使团到过的亚非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还保留着郑和的各种遗迹,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传说,并且还在进行着各种纪念郑和的活动。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有三宝瓏、三宝港、三宝洞、三宝公庙等,苏门答腊岛上也有三宝庙,在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塔、三宝宫、三宝禅寺等。但是今天,当人们纪念哥伦布远航发现美洲五百年之际,却有许多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提出强烈抗议。中美洲印第安组织首届会议在墨西哥拉斯卡拉斯的圣克里斯瓦尔城召开时,主题是“土著人抵抗殖民化五百年”。⁴⁹

在古代,我国的海外贸易和外交活动向来奉行传统的“厚往薄来”的准则,因为中华大帝国“无所不有”,无需西方之特殊商品,或可凭自己的丝瓷换取所需之物,绝不公然劫掠而伤我中央帝国之尊严,破坏我民族之光荣传统。中国从不欺凌发展迟缓的海外弱小国家,而是千方百计予以扶持。故历史上整条“海上丝瓷之路”是条和平友好之路⁴⁹,中国是传统对外和平友好的国家。在这种准则下,郑和的远航给国内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它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方面。首先贸易输入品(包括珍珠、宝石、珍奇异兽以及番香、没药、象牙、胡椒等物)大多供封建国家皇室或朝廷长期使用,极少参加民间经济交流,无从活跃社会经济。其次,外贸主要商品(丝织品和瓷器)或来自官办手工业,或从民间强行“买办”、征敛而来,故无助于刺激民间工商业的繁荣。因此,整个航海活动并未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明显的社会现象未曾出现,对此后百年左右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故中华帝国也未因郑和远航而变得更为富强。

同时,由于郑和航海主要内容乃是政治外交活动,所以它不仅未从所到国家地区获得贵金属和财物,相反却付出许多。其一,每次航行本身,都要负担近三万人的经年消费。而这一活动前后延续了28年。其二,航行沿途所到之处,“开读赏赐”,又必须与帝国的地位相称,一去数十国,开销亦颇可观。其三,由于郑和的远航,亚非许多国家的使节纷纷前来中国访问,有时一次就达一千多人。作为封建帝国的明廷,为了“泽被四海”,大摆排场,赏赐来朝使节,所费不赀。⁴⁹所以,郑和航海虽基本上达到了其政治目的,郑和时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华大地出现了四夷平安,万国来朝的鼎盛景象。但在经济方面,它不仅没有促进明朝经济的发展,反而构成一项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成化年间就被人评为“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⁴⁹成祖晚年对此已有察觉,仁宗即位后,那位永乐朝主

管财政的能臣夏原吉,就立即提出“罢西洋取宝船”,作为当务之急的几项措施之一。^②

郑和之后,中国再无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变化,经济发展停滞,科技进步迟缓,综合国力削弱,迅即为西方所超。渐渐地,中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

3

十五世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海洋的世纪。^③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活动,都是环球航线开辟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与文化的汇合、发展作出了共同的贡献。哥伦布的航行计划早在1474年已开始酝酿,他在著名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保罗·托斯堪尼地圆说理论指导下,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直到东方的壮举。由此揭开了大西洋的神秘面纱,把东西两个半球联结为一个整体,哥伦布在金银财宝欲驱使下的航海活动却不自觉地走在了历史的前端,充当了推动美洲历史纪元和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先锋,也推动了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西欧社会生产的发展,使西欧最终摆脱封建制度的统治,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哥伦布的伟大还在于迅速接受科学新观念,在其指导下,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证实其真理性,实现其价值。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巨人,其本人历史功绩亦尽在于此。

郑和还比哥伦布要早开始其远航活动,他的航行使他成为集此前一千多年中国关于海外知识与远洋知识之大成的人物。作为世界航海史上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航海家外,他还是个坚定不移执行中国传统的睦邻外交政策的伟大外交家。

但是,十五世纪的封建中华帝国,依旧偏重农业经济,不注重货币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观念淡漠。封建帝王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仍固守着中国是世界中心,东南西北四方皆是未开化的蛮夷的地理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地球只是一个平面,而非立体的圆形星球。郑和这支船队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使航行范围局限于书籍的和臣服的诸番国内,他本人也只满足于完成明室使命和弘扬我中华帝国之威武与富庶。虽然当时明朝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船队,具备环球航行所需的一切物质装备和技术条件,但在陈旧观念和孤立自傲心态的支配下,其船队终于只能涉足非洲东岸,而不可能跨过好望角去了望更遥远、富有挑战性的大西洋。国家的先进与落后,民族的兴旺与停滞,从此在世界的东西方交换了位置。假如郑和能够再向前跨出一步,也许历史将是另一种情况,然而,历史必竟是无法假设的。

仅以此文纪念我国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和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

注: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卷10。 ③《明史·爪哇传》卷324。

④参见陶松云、张一东《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与葡萄牙人早期海上探险事业之比较》、《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1,页450。

⑥The Spanish letter of Columbus to Luis de Sant Hngel, London, 1893. P. 13.

⑦G. R. Potter,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1957, v. 1, p431, p134, p450.

⑧福斯特:《美国政治史纲》页42。

⑨⑩⑪⑫⑬⑭⑮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Harvard, 1934. p34, P134, P192, P453-454, P202.

⑯《明史·郑和传》。 ⑰费信:《星槎胜览》后集·渤泥国。 ⑱罗曰琿:《成宾录》卷6,真腊传。 ⑲法国《解放报》,1991年11月15日。

⑳陈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贡献》,《明报月刊》,1991年7月号。

㉑参见何芳川:《十五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㉒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㉓《明史·夏源吉传》。